

二十世纪西方
新学科评介

冲突与合作

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

●主编/倪世雄

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吸引了多少有识之士去探究并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了解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流派的演变进程、产生背景、主要观点和最新发展，将会对你有所裨益。



四川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法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学者雷蒙·阿隆曾说过：“理论是通向客观的必由之路。”理论反映客观，是实践的升华，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理论科学也是如此。

《冲突与合作》是一本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书，它试图从不同角度考察和反映国际关系的“客观”。这本书的书名大致可以勾勒出这一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该领域的学者们所作的种种理论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国际关系学领域几乎是权力与权力冲突论的“一统天下”。60年代客观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第三世界的

兴起和相互依存趋势的加强，大国的强权政治不灵了，合作与冲突、和平与发展、经济与政治同时并同样重要地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使该学科无论在内容上或在方法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冲突与合作”较为贴切地摄取了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学的全景。

如果说这本集子有什么特色的话，那么其特色恐怕就在“评介”两字上。其一曰“介”。集子里的15篇文章排列有序，从纵向较全面地反映了国际关系学从现实主义到传统主义到科学行为主义到新现实主义各流派的演变过程；从横向则较系统地介绍了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学说、代表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二曰有介有“评”。所入选的每篇文章都力图做到介评结合，除了重点介绍各理论流派的产生背景、主要观点和最新发展之外，并对其优缺点、强弱处以及对国际关系发展和外交决策与实践的影响作了客观的评述。

西方国际关系学奠基人之一的汉斯·摩根索曾生动地把国际关系理论比作是一幅幅反映时代的巨大的“油画”。他强调说，国际关系理论不是摄影作品，而是油画作品，远看十分逼真，近看线条就显得粗糙了。我们这本集子是介绍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评介”，它当然就是一幅更为粗疏的“油画”了。在我国，研究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只是近几年

的事，但是发展很快，成绩喜人。有关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文章、译作、专著不断地问世，研究者们已不满足单纯的介绍，而进入了评介结合、突出评论的阶段，特别是这一二年，关于如何在引进和借鉴人家有用东西的基础上，创建我们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企求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这一时刻，我们编写这本集子，希望它能在开拓思路，活跃研究，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发展方面，起到一些作用。

这本集子的撰稿人是一批思想活跃、学习刻苦、勇于求索、奋发向上的年轻人，我和他们一起探讨、切磋于学林之中，对我说来是一次愉快的经历。这里，我还得衷心感谢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王国明副教授、徐宗士教授、刘星汉教授对这本书的鼓励、指导和帮助。我深信，依靠全国国际关系领域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在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作出新的成绩。

倪世雄

1986年12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前 言	倪世雄(1)
第1章 政治现实主义及其研究方面	王伯军(1)
第2章 权力政治论	孙超雄(24)
第3章 均势理论	童之伟(49)
第4章 国家利益论	孙建中(73)
第5章 国际关系伦理学	辜建中(96)
第6章 体系理论	孙江锦(120)
第7章 相互依存理论	章忠国(142)
第8章 外交决策理论	周帆 赵英顺(158)
第9章 沟通理论	何秉石(184)



- 第10章 影响理论** 吴 马(201)
第11章 博奕理论 张敏芳(220)
第12章 国际关系心理分析理论 马 丽(236)
第13章 世界政府理论 赵正祥(256)
第14章 国际经济政治学 吴开平 桑玉成(271)
第15章 行为主义的计量分析方法 潘 倩(292)
- 主要参考书目** (312)

第1章

政治现实主义

及其研究方法

■ 王伯军

历史是过去的政治。

理论的实质是历史。

——雷蒙·阿隆

政治现实主义是在本世纪30年代末期与政治理想主义的争论中形成的。在40年代、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后来尽管受到行为主义的挑战，但其影响仍然经久不衰，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的对外关系实践中，主要还是以政治现实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在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内部，不仅不同代表人物之间的观点有所分歧，而且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看法也有不

同之处，但万变不离其宗，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始终没有改变，这便是：第一，人性本恶及其不可改变说；第二，国家利益及权力政治说；第三，力量均衡及防止战争说。政治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它们是：（一）、哲学研究；（二）、历史研究；（三）、现状研究；（四）、法律研究。其中以现状研究最为典型。

哲 学 研 究

哲学研究是指作者根据本人对世界、对人的根本观点来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

早期政治现实主义者、美国新教领袖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详尽地以其哲学 (神学) 观点分析了国际政治现实。他著有 3 本代表作：《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1932)、《基督教与强权政治》 (Christianity and Power Politics, 1940) 及《造化及人类的命运》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1941—1943)。在这些著作中，他从基督教原理出发，认为人有“原罪” (又称“始祖之罪”)，故靠人本身的努力是无法在世界上建立起和平和善意的乌托邦的。他认

为这一信仰对于解释邪恶问题是绝对必需的。尼布尔论述道，推动个人的动机主要是自尊心、生存欲望和攫取权力的意志等因素。生存欲望含有利他的可能性，因为人只有在完成对别人的义务中才能实现他真正的自我。但人并不是只对自我的实现感兴趣，他们还为权力和威信而努力，因此生存欲望就几乎自动转变为攫取权力的意志。尼布尔为了说明人的这种无穷欲望，甚至说人还不如野兽。他认为，肉食猛兽在嘴里塞满食物的时候便不想再去掠获，但是人的欲望是用他的想像来喂养的，因此在他想像所及的普遍目标都达到以前，他是不会满足的。尼布尔不仅正面阐述他对人的看法，并且又从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中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他说，从来没有一个环境决定论者解答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好的，堕落和暴虐的制度怎么能产生？尼布尔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1950年11月19日）中这样写道，正象19世纪的“准宗教”迎合了乐观主义的、充满希望和自欺欺人的浪潮一样，每个社会安定时期都诱使人们否认生存中的狼狈相，使他们追寻某些简易的救赎方法，而放弃那种向他们的生活根源挑战的方法。正象马克思主义主张用财产共有的救赎方法消灭一切罪恶，正象科学允许用技术改革结束所有弊端一样，各种简单化的治疗方法都是从其

错误的信仰中产生的，因为他们认为罪恶的根源都在人们的复杂自我之外。

在阐述了他对个体的人的看法后，尼布尔还认为，群众或群体的行为同其个体成员的单独行为相比，是从更低级的冲动出发的。在每一人群里，与个人在个人相互关系上的表现相比，总是成见更多、激情更多，而良心较少，对别人的需要和权利的领悟能力也更弱。尼布尔分析道，一般地讲，无论怎样夸张人们的残暴和自私几乎都不过分，他认为这一点在群体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各阶级、各种族的多数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总是蛮横地对待对立分子，丝毫不顾及理性和良心的要求。

尼布尔把国家间的冲突当作一种特殊形式的集团间的对抗。他断言每个国家都有扩张的欲望，这种欲望的根源是生存的本能，但很快就超出了生存的本能，生存的意志变成攫取权力的意志。正因为他对国家意志的论述是他对人的意志的论述的延伸和发展，所以他認為在人类社会，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尽管他认识到现实世界的经济秩序是不公平的，但他否认能够用废除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消除战争，他辩解道，国际战争是人类最古老的习惯之一，既然它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前就早已存在，它就不能完全归罪于资本家。

尼布尔的早期神学观点接近自由主义神学。他

曾在30年代中任社会党领袖，但在1940年6月，他因为欧洲大战以及美国对欧战的关系脱离了社会党。此后，他转而猛烈攻击和平主义，他认为，暴力并不总是恶的，而非暴力并不总是善的，因此，在暴力用于良好的时，一个有理性的社会将会替暴力辩护。故他在脱离社会党后就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激烈反对者，成了最早主张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人物之一。当时的美国，在许多新教牧师与理想主义者都信奉不抵抗哲学的情况下，尼布尔能如此坚定地反对德国法西斯，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尼布尔当时采取反法西斯立场的指导思想是：战争的罪恶相对于违反基督教精神的暴政来说，还是小得多。

可以这样说，尼布尔是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精神教父，他对个人、群体及国家的论述是整个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哲学指导思想。在其以后的政治现实主义学者中，除了摩根索以外，很少有人系统地从哲学角度去论述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他们是把尼布尔的政治哲学作为其理论的当然前提，而把其重点放到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所以，了解尼布尔的政治哲学思想对理解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十分必要的^①。

① 参见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0—335页；

参见《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31—1733页。

政治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 (Hans Morgen thau) 也较详细地阐述过其政治哲学。他认为，为权力而进行的亘古不变的斗争，是作为“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的人的本性。由此出发，他在《列国政治论》一书中写道：“国际政治，亦如其他任何政治一样，是为获得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为权力进行的斗争在时间上无所不包、在空间上无所不在，这是历史经验赋予的不容置疑的事实。”^①因此在摩根索看来，整个世界历史的内容就是各国“准备战争、积极参与战争或从战争形式的有组织暴力中获得复兴。”^②正是基于国家政治总是为权力而斗争这样的认识，摩根索在大量的政治现象中抽象出了三种模式，即为了“保存实力”的政治，为了“增加实力”的政治及为了“显示实力”的政治^③。在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中，这三个政治模式是比较重要的。

美国前总统、政治现实主义者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论述了人性、和平与战争问题。他认为，人类具有野心、侵略性和自私性，因此理想主义者所希望的那种“完美的和平”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尼克松认为，现实世界的和平（他称之为“真正的和平”）

^{①②} 汉斯·摩根索：《列国政治论》，第13—14页；第17页。

^③ 汉斯·摩根索：《列国政治论》，第21页。

必须同人们的野心、人们的自尊心和人们的互相憎恨一起共存。因此若要获得和维持“真正的和平”，就应该考虑两点：其一，“冲突是世界上的一种必然事态”^①；其二，“国家只有在它们认为它们将从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才诉诸侵略。”^②因此，除非能改变人性，在一个国家间相互角逐的世界上要实现切实可行的、宜于人类生活的和平，唯一的办法就是使战争无利可图。”^③

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是指从分析历史发展过程入手，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汉斯·摩根索是运用此种方法的典型代表。他把视野放到欧洲历史大舞台上，通过分析英国及欧洲大陆国家的外交实践，从而得出了与著名英国政治家兼外交家帕麦斯顿同样的结论：国家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摩根索认为，国际社会是霍布斯式的不断冲突或者冲突威胁的领域……其唯一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法则（不可能有其他法则，因为没有超国家的最高权力来制定法则）。在摩根索

^{①②③} 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的理论中，下面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摩根索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并不比道德的抽象概念有更多的意义，美国在当代世界的真正敌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俄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果俄国政府是由沙皇或者由米留可夫自由派统治，俄国的危险性并不会减少。第二，摩根索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与欧洲的均势联系在一起的，但二次大战后，由于苏联太强大，英国已不可能在欧洲大陆国家中进行操纵以保持一个对它有利的均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是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政策的），也就是说，欧洲已失去了均势，这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怎样应付这种局面呢？摩根索认为西方国家应该追随美国的领导，并且坚持美国应该强大到足以遏制侵略、但又不能强大到足以使它妄自尊大而不愿与它的对手进行谈判的地步。由于核武器的杀伤力太大，战争已变成人类毁灭的同义语，因此摩根索认为，谈判是很必要的，西方盟国应尽快与苏联政府在广泛的问题上讨价还价，西方政治家应设法去发现其对手有什么安全需要和要求，再努力使这些需要和要求同西方自己的安全必要条件协调起来。正如邱吉尔所说：既不排除绥靖方法，又必须从实力出发^①。

^① 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72—474页。

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与《真正的和平》两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战后国际关系史中（特别是战后美苏关系）的“遏制”与“缓和”问题。尼克松认为，美国从4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遏制”政策首先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其目的在于使得苏联在侵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时面对不可改变的对抗力量。尼克松认为美国实行“遏制”政策是成功的，因为“从1945年到1949年，欧洲有八个国家、亚洲有两个国家变成共产党国家。但是在从1949年到1974年这25年中，在充分执行遏制政策的情况下，只有两个国家——北越和古巴——变成了共产党国家”。①

尼克松认为，当他上台执政时，世界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其一，苏联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了，特别是其核武器有了极大的增加；其二，苏联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三，东欧国家正在悄悄地不断努力扩大自己的行动自由；其四，中国已经开始把苏联而不是把美国看成是它的主要对手②。面对这样的形势，尼克松政府开始执行“缓和”政策，但这是一种“清醒的缓和”。所谓“清醒的缓和”就是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它不是谅解，谅解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达成一致意见，它也不是

① 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5页。

② 尼克松：《真正的战争》，第345—346页。

绥靖的同义词。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和苏联之间取得一致意见，相反地，它意味着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它能提供一种手段，以便和平解决那些能够解决的分歧，而容忍那些无法解决的分歧。”^①“清醒的缓和”还必须建立在足以挫败苏联讹诈威胁的军备实力和意志力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实力和我们的意志力向苏联人明确地表明，当他们威胁我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是冒着发生战争的危险的。”^②尼克松认为，“清醒的缓和”政策是行得通的，从1969年到1974年，“我们把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结合起来使用，以阻止苏联推进。我们准备在必要时向受他们威胁的任何国家提供直接的或间接的军事援助。我们还同苏联人就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谈判。”^③尼克松认为，正是因为他执政时期执行了“清醒的缓和”政策，故在那段时期没有一个国家被苏联集团争取过去。不仅如此，在美国的压力下，苏联在1970年放弃了它要在古巴建立一个核潜艇基地的企图，放弃了它假手叙利亚推翻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的做法。1971年，苏联从支持印度吞并巴基斯坦的企图后退。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期间，苏联放弃了要派军队进入中东的威胁。“1972年，在首脑会议前

①②③ 尼克松：《真正的和平》，第29—30页；第30页；第30—31页。

夕，我们下令轰炸海防市并在这个港口布雷，以便制止北越人的攻势。那些不了解清醒的缓和的人曾经认为，这一行动将会破坏那次首脑会议。他们想错了。它加强了我们手中的筹码，帮助为达成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协议扫清了道路。”^①

尼克松认为，在福特政府及卡特政府时期，由于实行了没有威慑的缓和政策，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导致苏联人在阿拉伯半岛、在南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大了他们的控制。尼克松又认为，里根入主白宫后，又恢复了威慑政策，其行动赢得了苏联的尊重。“由于他勇敢地面对苏联人，他已经使他们急着想同他一起坐到谈判桌上来。”^②

尼克松还谈到了国家意志问题。他认为英国游击战专家罗伯特·汤普逊关于国家力量的定义（国家力量等于人力加资源再乘以意志）是十分精辟的。尼克松认为国家意志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本身所表现的意志，还有国家的敌人所看到的那种意志。”^③尼克松特别强调后者的重要性，认为必须让敌人认识到，其挑衅会遭到强有力的反击，直至动用核武器。尼克松认为苏联对外行动的基本规则就是用刺刀进行刺探。如果碰到钢铁，就撤回去；如果碰到软东西，就继续下去。所以美国必须

^{①②} 尼克松：《真正的和平》，第31页，第33页。

^③ 尼克松：《真正的战争》，第8页。